

贝内特访美，能否“重塑”美以关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钮松



钮松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8月26日结束对美国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是贝内特6月就任总理后首次出访。

访美期间，贝内特会晤美国总统拜登及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等高官。贝内特此行希望重塑以美关系，并期待双方在伊朗核协议、以巴冲突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贝内特此次美国之行能否如愿？双方领导人重点讨论了哪些话题？美以关系未来走向如何？我们请专家为您详细解读。

——编者

问：贝内特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达到哪些目的？

答：贝内特在就任总理后仅两个多月便开启了疫情下的访美旅程，动机一目了然，那便是重塑美以关系。对于以色列方面而言，通过首脑外交来为美以新领导人之间走向熟络并巩固持续降温的美以关系至关重要。

贝内特的忧虑并非多余，自今年初拜登政府正式上台以来，近年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的美以关系遭遇了显而易见的挫折。

尽管以色列2020年实现了与4个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全面突破，与沙特也进行了一系列公开互动，但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关系，背后是特朗普政府力促美以沙三国构建“反伊朗准联盟”所取得的成效。

美以之间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通过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美国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美国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美国力促以阿关系新突破等一系列进展呈现出来，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与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二人转”所达成的。

当前不论美国还是以以色列，新领导人及其领导的政府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以关系的重塑向“深水区”发展，贝内特的此次访美只能是一次初步的“试水”行动。

从以色列方面来看，贝内特政府取代连续执政12年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既有以色列

2

「根基」不稳 限制走向「深水区」

政界和民众对于2019年4月以来，两年内展开四次大选且组阁均遭遇困境所产生的政治疲劳，也有对于内塔尼亚胡深陷多重涉腐案的不满情绪，更是右翼阵营的贝内特临阵倒戈对内塔尼亚胡的“釜底抽薪”所致。尽管贝内特政府成功组建，但糅合了中左翼“拥有未来”党、统一右翼联盟、中间派的蓝白党以及五十年来首次参加组阁的阿拉伯政党，这种多元思想间的跨度之大使其遭遇能够维持多久的质疑。

此外，以色列总理的任期一般为4年，而贝内特的任期只有2年。根据新联盟政府的权力分享协议，2023年，拉皮德将接替贝内特成为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与拉皮德在总理职位上的“接力”设计也限制了贝内特施政的期限与政策的延续性，两人的“接力”是否会顺利实现也备受关注。

从美国方面来看，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打出“美国回归”的旗号，但中东政策并未完全定型，仍在奥巴马与特朗普政府的“遗产”中徘徊。分析人士指出，贝内特领导的执政联盟并不稳定，因此急切希望得到拜登政府的支持，但拜登政府难以满足贝内特对美以关系的全部设想。

此外，拜登已经79岁高龄，他在与贝内特会晤时貌似睡着2分钟的尴尬画面，似乎也加深了舆论对他健康状况的疑虑。拜登与贝内特，一个年事已高，一个任期减半。年龄相差30岁的两人如何在短期内领导各自政府协同重塑美以关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显然难以通过贝内特的一次访美就能实现。

1

“新领导”共同面对“老问题”

问：以色列总理访美重点讨论了哪些话题？

答：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将美国作为今年6月13日宣誓就任总理以来外交出访的“首秀”之地，是一次中规中矩的外交活动，也是美国杜鲁门总统开创的美以延续数十载盟友关系的惯性使然。这也反映了贝内特试图通过面对面的方式直接向美国传递更为明确的信号，即以以色列新政府将继续置美以关系于以色列外交中最为优先考量的地位。

贝内特的美国之行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首先是新冠疫情仍在美国肆虐。美以领导人会见时的社交距离和各色口罩无声地提醒着国际社会，这是两国领导人在疫情下的难得会面。

其次是贝内特此次访美恰逢美军从阿富汗一走了之、阿富汗塔利班攻占首都喀布尔，阿富汗局势日趋复杂的特殊时刻，其背后浮现的是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美国盟友对于拜登政府“喀布尔时刻”的疑虑。

8月26日喀布尔机场造成大

量人员伤亡的恐袭事件使得原定当日举行的美以领导人会谈不得不推迟到第二天，也使得贝内特原定的“快去快回”的紧凑速访计划被迫进行微调。

8月25日，贝内特抵美伊始，便相继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举行务实会谈。8月27日，贝内特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两国新领导人之间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据报道，贝内特与美国领导人的会谈内容涉及美以伙伴关系、美国对以安全承诺、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地区安全、反恐、海上航行安全、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及无人机系统的防务合作、援助巴勒斯坦疫苗等诸多问题。

尽管议题令人眼花缭乱，但贝内特的核心关切仍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伊朗问题和巴以问题，所有具体的关切都是围绕这两大问题而铺陈开来。同为今年才上任的新领导人，拜登与贝内特为国际社会对这两大老问题的走势带来新的憧憬。

美以两国都认为，必须确保

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策略不同。

拜登政府上台后试图通过外交谈判实现美国和伊朗恢复履行伊核协议，以此来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以色列政府不满美方尝试重返伊核协议，认定伊朗核计划的目的是研发核武器。

拜登表示，美方正优先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伊核问题，如果外交途径失败，美方准备转向“其他选项”。贝内特对拜登此番表态表示满意，并称两国将就针对伊朗的“全面战略”展开讨论。

双方更为明显的分歧在于如何处理巴以问题。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与巴勒斯坦的关系逐渐回暖。拜登多次表示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还计划在耶路撒冷重开负责巴勒斯坦事务的美国总领馆。

贝内特上台后，在巴以问题上继续坚持强硬立场。分析人士指出，美方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只字未提贝内特对巴以问题的表态，说明双方在这点上分歧依然较大。

3

特殊盟友关系也需及时修补

问：未来的美以两国关系走势如何？

答：尽管贝内特的访美之行带有“重塑”或“校准”美以关系的意味，但纵观美以关系史，两国作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独立主权国家，不可避免会产生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另一方面，两国之间又是一种特殊的盟友关系。美以之间虽是盟友，但美国历届政府对以色列态度的亲疏及具体政策不尽相同，美国会在中东政策的总体考量中适时调整以色列所占的权重。

作为美以不对称盟友关系中相对弱势的一方，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触动以色列方面的紧张神经。处于中东地区总体外交孤立中的以色列最为关切不仅是国家安全问题，

更是未来前途的问题。正因如此，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参与伊朗核协议的多轮谈判令以色列充满不安，拜登上台后对于政治前途未卜的内塔尼亚胡的冷处理也使美以关系蒙上新的阴影。贝内特领导的新政府上台后，以色列将此作为内部政治革新与重塑美以关系的契机便顺理成章了。

贝内特此次访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修补与美国民主党领导层的关系。内塔尼亚胡主政期间，以色列与美国民主党关系紧张。内塔尼亚胡曾公开批评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推动达成伊核协议。

贝内特出访前曾表示，以色列和美国现在都有新的政府，他“带着一种新的合作精神”前往美国会晤拜登。美方高官也指出，拜登在贝内特宣誓就职后不到两小

时就通话表示祝贺，这是美方支持贝内特政府的明确信号。

因为最近的“喀布尔时刻”，美国在面对国际社会的嘲弄时呈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但在支持乃至偏袒以色列上依然不遗余力。以色列在二战废墟上的诞生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推动极为重要。美以特殊盟友关系延续迄今。即便如此，贝内特在与拜登的会谈中，仍要求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进行再保证，拜登也如其所愿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尽管美以之间在对伊核问题等诸多国际事务的看法上分歧明显，但这些并未能动摇美以关系的基石。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美国始终偏向的仍是以色列。



阿富汗反恐20年，美国为何成为最大输家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张家栋

“9·11”事件至今的20年，也是美国在阿富汗反恐的20年。喀布尔机场的恐怖袭击和爆炸，给阿富汗战争打上了一个问号，并再一次将美国带回了出发点。

越反越恐？

反恐这20年，其实也是人类社会

会全球化、信息化进程发展迅速的20年，很多事物都在新形势下发生了变化。

很多人感觉到“反恐反恐，越反越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产物：时间和空间距离被消除以后，人们感知到的恐怖事件更多了，对恐怖的感觉也更加强烈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世界更加危险了。相反，在过去20年中，人类社会整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和平、安宁与发展。

首先，在世界范围内，这20年是人类社会一个比较长的安宁期和发展期。大国之间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没有再发生“9·11”式的重大恐怖事件，并在反恐等问题上形成了长期共识。“9·11”事件爆发以后，

各国迅速达成共识，阶段性组成全球反恐统一战线。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并且这一趋势还影响到全球治理的其他领域。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共识，推动了各国为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生长环境等议题上合作步伐的加快。

其次，即便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在反恐战争时期，状况也不一定比以前更差。在阿富汗，反恐的这20年是这个国家自1973年以来少有的安全与发展时期。当地人口从2001年的2100万，增长到2021年的近4000万，教育和医疗条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个中教训

当然，事物都有两面，20年的

反恐战争也给人留下两个教训。

一是，反恐目标不能扩大化。美国在阿富汗的错误，不是美军力量不足，而是前期太顺利，引诱着美国政客忘记了初心，将反恐目标转换成阿富汗国家重建目标。

阿富汗是阿富汗人的，不是美国人的。美国开出的药方，不管如何“美妙”，未必是阿富汗人所欢迎的。所以，美国在阿富汗的任务，根本就不应该是在这里建立一个统一的集中的“美式民主”国家。

反恐战略目标的扩大化，也导致美国在阿富汗投入的扩大化，最终不仅没有实现目标，反而空耗了美国的国力，并引起阿富汗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反感。

二是，反恐手段不能极端化，不

能脱离法治的轨道。恐怖分子不受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约束，而反恐的一方，千万不能效仿恐怖分子那种无法无天的自由，要接受相关法律和规范的约束。当然，遵守规范是有代价的，会提升成本、增加伤亡、降低效率。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最受人们诟病的部分便是为了保护美军自身的安全，不惜牺牲当地民众的合法权益。

美军在“网络探照灯”之下，既不拥有行为自由，又不愿意付出太多的人员伤亡代价，于是只能“自缚双手”去追求那个被无限放大的重建目标，失败也就难以避免。

其实，美国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只是不愿意吞下失败的苦果而已。